

“沉不下去的橡皮鸭”与科普工作者重任

孙 倩

最近，气功“大师”王林浮出水面，各种媒体纷纷报道评论，引发了新一轮对“特异功能”反思和科学精神之理性质疑的讨论，《南方周末》就此还专门采访了老一代“破迷反伪”的科普工作者，回忆了近几十年来破除当代迷信、反对伪科学的历史及其原因。

其实，这些问题在“法轮功”取缔之后，一些专家学者就“法轮功”坐大成势的原因——二十多年伪科学与迷信泛滥——进行了分析，科学精神得到了弘扬，同时科普专家学者指出，科学的理性怀疑精神应该作为社会公众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冰冻亦非一日能解”，“人体特异功能热”和“伪气功热”以及伪科学与现代迷信的流行，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广，社会上对其思想根源上的澄清远没有完成。反映在社会思潮上，就是近十几年来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出现了反复争辩与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人说迷信、伪科学和神秘主义现象就像一只“沉不下去的橡皮鸭”，经过社会批评沉寂一段时间后，又会重新浮出水面，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因话题与形势、事件等不同而各异。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10年以来，李一“道士”、张悟本“大师”、秦铭远“灵修导师”、王林气功“大师”再次冒出江湖，欺骗世人，就说明了这一现象。但是又有多少人仔细追究过，这样的欺骗背后真正的原因，不仅是社会的浮躁和利

欲熏心，更有科学精神并没有在人们思想认识上形成思维习惯。这一切都反映出，在社会与公众这样的领域中，捍卫科学尊严和弘扬科学理性精神还任重道远，科普工作者应当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

本文粗略描述近十几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和学界同仁，捍卫科学理性的努力，展现科学与社会公众领域中，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神秘主义等两条对立战线上的力量抗衡，从而理解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在当代的重要性，理解中国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实际意义。

1 复归、挑战与呼唤

1.1 复归：科学理性复归社会主位的努力(1999—2002年)

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社会思想仍旧混乱，很多人对“法轮功”为何能成势，气功到底是什么，有无特异功能之说，对于科学与伪科学区别等问题，还存在模糊认识，在理论上还有亟待澄清的误区。正如《科学与无神论》发刊词（1999年9月）中指出：“近数十年来，一股反科学、反理性的思潮在西方逐渐泛起，它把个人的能力神异化，把个人意志、自由和创造随意化。在这股思潮的基础上，不断涌现出形形色色的教主崇拜集团。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我国也有人以传统的‘神功’，干扰科教兴国的大业；利用群

收稿日期：2013-08-15

作者简介：孙 倩，供职于中国科协，Email: ssq2817@sina.com。

众性的健身活动，宣扬‘神功’和各种封建迷信，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破坏社会安定。对于这股思潮，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因此，批评特异功能、伪科学和迷信成为思想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工作方面。

思想理论界在这一阶段，对“法轮功”猖狂时期的伪科学（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批评成为主调，目的是在全社会营造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理性的氛围。在反思“法轮功”何以成势问题时，专家们对产生它的那些伪科学和现代迷信现象、根源以及判别标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批评伪科学与迷信对社会影响与危害，从历史文化和现代科学成果角度进行了原因剖析，并就其对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在理论上，澄清了有关气功治病的荒谬、伪气功的骗人实质、“特异功能”的巫术与翻版魔术的本质、古今中外同类“超常现象”研究的否定性结论；澄清了有关周易算命、风水预测、相术算命、灵魂信仰（鬼魂）等迷信问题，分析了迷信与神秘主义思潮的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文化根源，解答了如何以科学标准来判别它们；对一些混淆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概念的言论，借机攻击反伪科学运动合理性的问题，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反驳。

这个时期的反伪科学讨论，总体上是将弘扬科学精神，将科学理性复归到社会舆论的主位了。但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在理论上，有些学者对科学与伪科学、科学理性与迷信等概念故意混淆，还有人为“法轮功”是“超常科学”进行辩护，也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对反对伪科学的人士进行攻击。对此，反伪科学专家积极回应，撰文力驳这些论调的荒谬与本质。

在这次的思想讨论中，有几位鲜明的代表人物和特别的事件。他们的思想和做法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1999年6月，《人民日报》刊载了任继愈先生文章“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开启了揭露与分析新形式的迷信与伪科学的新时代；龚育之、何祚庥、潘家铮、胡亚东等人于1999年7月创

办的《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上撰文，从理论和实践上揭露和批判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的实质与危害，特别是潘家铮院士的文章“向心陷迷信的科学家进一言”、对龚育之先生的专访“科学思想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对弘扬科学精神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对那些曾经支持、参与过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科学家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特别提出共产党员、高级知识分子应注重培养科学精神，提出要对党员、公众和青少年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1999年8月和2000年12月，民间组织的两次表彰，鼓励了1999年以前一直在反对伪科学战线工作的“斗士”。同时，还有司马南与兰迪1999年联手挑战通灵人的义举，2000年1月评出十大伪科学著作，以及更多的专家到高校进行科学精神的宣传。

很多专家通过对一些古老迷信和现代迷信问题在理论上的分析与澄清，提出了反对迷信与伪科学的对策，主要是要从消除迷信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上入手，从发展科学教育、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战略上入手，从营造全社会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的氛围入手，同时要加强对迷信活动和伪科学的监管力度。在传统文化问题上要以正确的“扬弃”态度来对待。

这些观点至今仍为主流观点。

1.2 挑战：科学理性面临新挑战（2002—2006年）

2003—2006年，发生在科学与公众领域中的思潮之一，主要是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割对立起来，来讨论科学对社会的作用到底是好还是坏，到底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要反对科学、以所谓的“敬畏”回到蒙昧状态，是要继续反对伪科学还是要在《科普法》中取消“伪科学”一词。

这次的论争是以反对“科学主义”问题开始的。在反思科学是把“双刃剑”时，一些学者给中国现行发展科技与向公众普及科学的政策和做法，冠以“科学主义”之词，加以反对。原因是认为科学运用给人类带来诸如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口爆炸、核武器恐怖等负面后果问题，同时科学把人机械化、工具化了，人性沦丧，道德败坏。由反对

“科学主义”，而进一步出现痛骂科学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谩骂科学是社会毒瘤和邪教的“反科学”声音。同时在对待“非典”和海啸灾害问题上也出现混淆科学与迷信界限、主张回归人类蒙昧状态的“敬畏说”言论。与之顺应的是捍卫伪科学的言论，如“为伪科学正名”、“反反伪科学”、“取消《科普法》中反对伪科学一词”等，认为存在所谓“科学外理论”，反对伪科学就是阻碍科学的发展，反伪人士是“科学警察”等。

当然针对这些言论，许多专家发表文章给予了透彻分析与批评。2004年龚育之先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题为“科学与人文：从分割走向交融”的文章，是较为全面分析并指出如何解决那些现实问题的代表作。他从“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与争论的历史视角，描述了中外学界关于“科学大战”“反科学主义”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科学技术运用的负面的社会后果，如何慎言“科学主义”问题，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问题，提出要加强科学与人文交融的现代命题，并赋予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含义，即“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这一时段的思潮表现之二，是与之并行的另一条路径，仍是延续前几年的反对“传统文化”招牌下的迷信之风。从2003年到2006年，除了对《周易》热问题的讨论外，有两个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话题，一个是《道德经》引发的“熊良山现象”，另一个是“风水术是环境科学吗？”的讨论。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了科学与迷信的问题，涉及到学术态度，是否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否要反对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的迷信与伪科学问题。

实质上，这段时期的讨论，对于我们了解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认识科学的深刻含义，理解科学精神，向公民进行科学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先进文化，有很大的相关性。学者出于对人类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进行

科学与人类社会之间发展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有专家认为，在处理问题的具体细节上，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很容易在讲人文精神时，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混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就为打着传统文化旗号的伪科学开了绿灯；邪教滋生的理论土壤，就是这种思想是非上混乱不清。无论是谴责科学破坏生态平衡的罪过，还是要指责科学怎样具有局限性，抑或谩骂科学是邪教、毒瘤，对科学恨之入骨，所谓的以人文的名义来实现“终极价值”，实际上要否定科学，反对科学，要将坚持科学发展社会、造福人类的道路，重新引回到“敬畏”神灵的蒙昧时代而无所作为。科学本身只是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存在与运行的规律，没有解决“价值”这样的“人文”或“人道”的任务，使用科学不当所造成的危害是“人”的原因，应该从“人”的因素寻找答案，而不是谴责科学。科学理性是解决现代发展中问题的有效工具，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其他的更好的途径。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科教兴国”战略，是要开启民智，运用科技成果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而不是要回到蒙昧时代和宗教专制时代。

有些专家敏锐地看到这场讨论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形成，特别是随着中国成功加入贸易组织，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交融将在所难免。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渗透将变得更为直接、迅捷、全面，并对我们已有的价值体系进行最大挑战和最大考验。新世纪或新时代运动所宣扬的恰恰是‘反科学、反理性’，这种思潮已影响到我国，而且宣传这些思想的组织和膜拜团体有的已经发展成为邪教，成为一股反社会的逆流。而在我国，从所谓‘神功异能’的兴风作浪到‘法轮功’坐大成势，恐怕与那一时期的‘非理性’、‘伪科学’的宣传有关。而现在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似乎又在形成一股思潮，在概念或定义不清的情况下，让公众去接受‘反科学主义’的宣传，会不会影响公众对科学价值的判断，导致

新一轮思想意识风波，成为新‘邪教’制造的理论先导和利用的工具？因为价值观念中，科学已经成为破坏人类的罪魁祸首，崇尚科学的社会主流被谩骂打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这20多年来，迷信、伪科学、邪教‘法轮功’给我们的教训太深了，我们总不该重犯‘历史的健忘症’吧。”

1.3 呼唤：呼唤新启蒙运动（2006—）

前述两条战线上对立论战仍在持续，而且各种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超自然”声称和“超常事件”常为各种媒体揭露，如2010年8月曝光的“神仙”李一道长，利用电流断症、治癌的特别“医术”和养生国学达人身份实施骗术；2010年5月曝光的张悟本“绿豆”大师养生骗局的“神骗”事件；2012年4月曝光的以“身心灵修养”为名实则推行“性爱灵修”、鼓吹淫乱的秦铭远欺骗白领名人的事件，以及2013年曝光的气功“大师”王林的魔术戏法的骗局等，各个媒体尤其网上对此类事件的揭露，形成了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舆论气势。这些揭露不仅引发世人对一次次骗局的反思，为何总是有人利用人性中轻信盲从的弱点来行骗而屡屡得手，而且也疑问：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宣传了那么久，竟然还不断有此类事情发生？那么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在学界，是否坚持科学理性问题的争辩，从前面两阶段非常具体的就事论事，逐步寻查到思维方式上，深入到观念层面上的认知，涉及到科学与宗教、文化、伦理领域了，视角也扩大到国际上。这个时期争论的本质在于是否要坚持科学理性的文明传统，坚持世俗的人文主义，反对迷信、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

我们首先看看这个问题的社会文化背景。继世界性的新时代运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融合传统宗教信仰复兴的新蒙昧主义和相信超自然现象的神秘主义的新思潮（如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宣扬新的神创论——“智能设计论”、复兴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股思潮对我国学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学术界随着国外宗教组织渗透而大量引入

神学著作，有人宣称“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声称“科学与宗教可以融合”，“宗教可以指导科学”，“宗教道德是最高的道德”。这些言论在思想界和社会公众中，尤其是对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方面和公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如对科学技术产生不信任、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对现实社会道德失望转而求向宗教道德，产生追寻宗教的情感倾向。与此动向相对反的，是在“科学”外延的问题上，国内学界进行了科学与宗教、道德方面的讨论，并大量引入倡导科学理性、批评性思考的现代国际组织——国际探索中心的“新启蒙运动”观念，对世俗人文主义运动和科学怀疑探索运动进行介绍和讨论。

这样，关于科学的话题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其内涵和语义层面上了，而是延伸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科学精神普及的重点不仅要澄清具体的迷信、伪科学、神秘主义的表现案例，开始转向到科学与社会的价值评判以及公众“三观”的领域了。这个时期的无神论、学者和科普工作者具体活动是：开展了大学生信教问题的调查研究与讨论；对科学与宗教、道德与宗教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建立和加强了国际探索中心联系与活动；呼唤新启蒙运动（世俗人文主义和科学的怀疑的探索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尤其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之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的讨论；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教育。

2 何以形成这样的轨迹

三个阶段的思潮表现，在逻辑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全球背景和我国社会转型期上来考察。很多专家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上的“新时代运动”“新宗教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和反科学思潮的催动，加之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精神领域的信仰缺失、道德水平下滑、社会心理失衡等问题，导致我国公众在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上出现不正常状态，具体表现就是“人体特异功

能”与“伪气功”等伪科学的流行，给社会和公众带来极大的思想混乱，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在“法轮功”问题出现后，思想理论界开展了一场正本清源、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复归社会主位的运动，正如第一阶段的情形。由于有了大量的反对迷信与伪科学的声音和材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特异功能、伪气功问题的不正确认识，遏制了愚昧迷信和神秘主义的肆意泛滥。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这些对于根本解决科学与公众领域里面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比如如何看待科学使用引来的负面影响，如何消除科学与人文的对立而实现融合等问题，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在思想认识上，理论界展开是否坚持科学理性、反对蒙昧迷信与神秘主义、反对伪科学的争论始终不断，出现了第二阶段的情况。究其根源，也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后，世界多元思想文化中的各种思潮不断涌入我国，影响我国思想理论界。尤其是国外反思现代化而持续不断且日益增长的非理性、反科学思潮，追求超自然力量的神秘主义思潮和复兴传统宗教的蒙昧主义思潮，成为一些学者追捧与热心传播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李一、秦铭远、王林之流还可以兴风作浪的现实思想原因。

当然，中国当代无神论学者和科普工作者关注到这一动向，并对其进行了研究，同国际上世俗人文主义运动的学者一样，积极呼唤“新的启蒙运动”，主张依靠科学理性解决现实问题、创造人间的道德与和谐社会，呼唤在我国坚持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主张依靠科技创新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在社会上大力普及科学，开启民智科学。这些形成了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

3 启示——“沉不下去的橡皮鸭”与科普工作者重任

纵观三个阶段不同重点，实际上始终围绕着是否要坚持科学理性问题。作为现代文明成果之一，它本来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S一种处理世事所坚持的原则。但是迷信、伪科学、“超自然”神秘主义的思想，在社会文化

中和人们的头脑中基于传统的原因而根深蒂固，它就像“沉不下去的橡皮鸭”，在批判声音过后不久，仍以新的形式出现。其表现是，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是在批判“伪科学”和“特异功能”、“邪教”的声音成为主流，科学理性回归主位后，又一次以批“科学主义”、“为伪科学正名”、“敬畏说”的新形式出现的反科学理性的回潮。而到了第三阶段，捍卫与反对科学理性思潮的争论，扩展到全球中，表现形式上就是在“科学与宗教关系”、“超自然现象”流行问题上争论不休，因而坚持世俗人文主义、以科学理性启蒙世人的无神论者与科普工作者呼唤，要开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应对“超自然的神秘主义”、“传统宗教信仰复兴的新蒙昧主义”和“后现代反科学”等三种思潮在全球的流行。这些说明神论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社会土壤相当丰厚，公众对科学与伪科学、迷信、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界限还划不清。因此，在科学公众领域中发生和发展的捍卫科学理性思潮，便有了基础性的意义。这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会产生影响。

近十几年来，思想战线上捍卫科学理性的思想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回复主位到重新受到挑战，从不断地讨论面临的新问题升华到应对全球三种反科学理性增长的思潮，是一个曲折艰辛的理论澄明的过程，这里面有科普工作者、反邪教工作者、无神论工作者和哲学界学者的共同努力。通过三个阶段的分析，我们看到，真正在中国社会上营造崇尚科学氛围，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识别迷信与邪教的辨别能力，还任重而道远。科普工作者应自觉承担当代文明传承的历史责任，推进科学文化在思想领域和公众领域的增长，通过具体的迷信、伪科学和神秘主义的案例剖析，捍卫科学理性的尊严，坚持反对反科学、反理性的思潮，积极传播识别真伪的科学方法，提高社会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科普工作者的知识和智慧，用于澄清理论是非与提高公众辨别能力上，从而更好地淘炼和澄清时代思想、把握时代精神，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责任编辑 谢小军）